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构对外开放战略的系统思维

谷克鉴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全球价值链的普及和深化驱动对外开放由 GATT/WTO 主导的“工具型开放”转向以开放型经济目标规范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变革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将贸易政策改革从“边境措施”推进至“边境后措施”的纵深领域,要求打破边境措施改革的局限,深度整合贸易、产业、技术与企业政策,以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构建对外开放战略的系统思维,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特有的缓解风险和不确定性功能,有效对冲全球化波动中的制度性摩擦并显著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从而形成高水平 and 具有韧性的制度供给,实现开放红利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由此必须准确提炼相关科学问题,广泛开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问题的学术研究,重视制度型开放战略意义的深度挖掘,并清醒地意识到制度型开放面临的各种挑战,为贸易政策的工具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构筑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提供有力的政策工具。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工具型开放;全球价值链;开放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6)01-0001-08

一、制度型开放的范式转换及其系统性建构

适应全球化新的复杂格局和我国扩大开放型经济新的战略需求,继二战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的以关税减让、取消数量限制等边境措施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贸易政策工具型开放(以下简称“工具型开放”)之后,制度型开放将贸易政策改革推进到一国对外部门向内延伸的纵深领域,深刻影响着当代贸易政策改革的范式转换及其科学概括,是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由开放型经济目标规范的广泛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变革。实施边境后措施改革,客观上需要调整有关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及其他影响外部价值链活动的企业政策,包括但不限于规制、标准、规则、管理的国际对标。基于系统论和控制论视角的考察,制度型开放具有极强的系统性,这显著地有别于孤立和分散的工具型开放——边境措施调整。制度型开放要求贸易政策改革突破边境措施调整的所谓“浅层整合”(Shallow Integration)扩展至边境后措施改革的所谓“深层整合”(Deep Integration)^{[1]①},不仅一举改变 GATT/WTO 作为最惠国待遇机制例外的部分国内商业政策改革情形,还因国民部门内影响各类企业外部价值链行为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技术政策和企业政策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2]从而需要运用系统科学和控制论的理论与方法,尊重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与有序渐进特征和最优目标原则精心设计和稳步推进。唯有如此,制度型开放方可呼应价值链活动在全球经

[收稿日期]2025-12-2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研究”(23JZD007)

[作者简介]谷克鉴(1960—),男,湖北安陆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邮箱: gukejian@rmba.ruc.edu.cn。

①深层整合(Deep Integration)源自计算机技术语言体系,与浅层整合(Shallow Integration)相对应。浅层整合限于计算机应用程序的基础界面间互动,而深层整合则显示更为广泛、紧密互联的系统关系及其功能。前者可确保功能快速实施和数据同步交换,但系统功能发挥和大规模数据交换受限;后者则可确保不同平台间数据的无缝对接,以实现更为复杂的工作流程与功能。经济学家们借助这一计算机语言用以刻画贸易政策改革中的关税和非关税等边境措施调整即浅层整合,而涉及相关的产业与竞争等国内政策改革则称其为深层整合^[1]。

济纵横捭阖的新现实和以我国对外开放为代表的贸易政策改革实践的时代要求。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实证明,转型经济中的对外开放必然伴随着广泛而深刻的政策调整和体制变革。历经四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对外开放,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①。与此同时,制度型开放利用一般最惠国待遇机制的独有功能提升贸易政策改革效率,革新多边贸易规则中有关国内商业政策改革的实施机制^②,更好地体现和贡献我国坚定维护多边体制、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政策主张和中国方案。无疑,科学界定、系统设计和稳步扩大我国制度型开放由此成为有效实施这一举措的全新课程。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本质上要求我们基于普遍联系的观点,构建对外开放战略的系统思维,在将贸易政策改革的重点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纵深推进的同时,统筹各类对外开放、传统的贸易政策改革与各类国内企业政策实施间的协调,避免单一改革措施、单边开放的“聚合逃逸”现象、降低开放措施的实施效果,以适应当今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全球化新格局。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2025 年度报告突出强调,只有超越单边思维,凝聚多边合力,才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迈向长期稳定与共同繁荣^③。

二、制度型开放的崭新时代背景

全球价值链的普及和深化极大地丰富了全球化的物质内容,而当代全球化的严峻现实又提供制度型开放的历史必然,这是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新的时代背景。

制度型开放历史性地成为扭转当下全球化颓势的必然选择。在开放型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限于浅层整合或曰边境措施的工具型开放天然地缺乏对形形色色的保护手段的立体感知能力。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对经济政策变化全球趋势的长期观察(见表 1),世界范围内仅产业政策关键元素的变化即可发现,其目标一改截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进口替代、幼稚产业保护、部门发展、渐进或选择性地向外部竞争开放,转向 20 世纪 80 年代的有限政府干预、横向政策指导以及吸引外资和径自引入外部竞争,之后进一步转向 21 世纪以来赋能商业环境、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给予中小企业支持等。对此,深层整合可实现贸易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企业政策的紧密协同、相机呼应,不再是孤立的贸易部门行为。这从一个重要侧面要求全球性的工具型开放必须走向制度型开放的历史嬗变。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全球价值链的普及和深化,使得浅层整合疏于防护的天然缺陷尽显。全球价值链的普遍流行和纵深推进大大削弱了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而各类国内经济政策组成的所谓“边境后措施”却大行其道。于是,国际经济活动出现了全球价值链的逆向选择,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和所谓保持产业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关切的“脱钩”行为更使全球价值链的调整雪上加霜,国际贸易政策体系调整面临挑战缘此变得更为复杂。所谓“深层整合”(Deep Integration)的制度型开放通过倡导和实现全球范围内高水平制度的稳定供给,挖掘制度型开放特有的缓解风险和不确定性功能,有效对冲全球化波动中的制度性摩擦并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在制度供给的稳定性和韧性中实现开放红利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

^①参见 2023 年 7 月 11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以及 2025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②GATT1947 第二部分的主要条款界定的国内商业政策业已从外延上构造制度型开放议题的雏形,但其游离于一般最惠国待遇机制例外的历史局限,使得国内商业政策改革几无进展。

^③详见:<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2025>。

表1 世界产业政策的演进及新主题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90 年代	21 世纪初至今	产业政策近期/新兴的主题
主要特点/主题	●工业化与结构转型	●稳定化、自由化、放任主义	●知识经济 ●全球价值链	●新产业革命 ●可持续发展
政策目标	●开拓市场、实现多元化	●市场驱动的现代化	●专业化与提高生产率	●现代工业生态系统的发展
关键要素	●进口替代 ●幼稚产业保护 ●部门发展 ●渐进和有选择地向外部竞争开放	●有限政府干预 ●更多的横向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开放 ●竞争环境暴露	●开放经济下的针对性战略 ●营造有利的商业环境 ●数字发展(信息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普及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 ●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与战略产业保护相结合 ●中小企业支持 ●技能发展	●技术能力发展 ●生产运营技术创新 ●学习型经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部门发展 ●公私知识与技术发展机构 ●获取外国技术 ●创业精神发展
政策环境	●国家发展战略的高政治合法性	●干预性发展战略政治合法性低 ●国际承诺对政策空间构成限制	●国家发展战略重新获得合法性 ●在特定领域具有适度的政策空间	●在新领域有更多政策空间 ●更加强调包容性

作为对外开放的具体或阶段性措施,工具型开放和制度型开放曾在转型经济国家历经多种组合和调整变化,而系统的制度型开放及其对工具型开放的有序替代则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必然选择。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普遍主张,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应当依据各国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条件和阶段循序渐进、自主推进,理论模型刻画的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一般被理解为由工具型开放驱动,最为典型的是刻画转型经济国家对外开放进程的“克鲁格模型”^①。该模型指出,一国贸易体制的开放程度与其国际收支状况紧密相连,其自由化进程通常始于旨在稳定国际收支的数量限制(如进口许可证),随后过渡到价格措施(如关税、补贴)与数量限制并用,并伴随汇率市场化及国内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套改革。最终,在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逐步取消数量限制、降低关税,使贸易体制达到较高水平的自由化。这种基于水平分工情景中聚焦边境措施调整的浅层整合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变幻的全球价值链日益普及和深化的新现实,于是着眼于深层整合的制度型开放呼之欲出。

诚然,具有严格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贸易政策改革往往呈现复杂、曲折的样式,而转型经济的对外开放初级阶段则包含了分散的制度型开放及其雏形,中国学者曾经将其概括为“贸易分散化改革先于贸易自由化改革”^[3]。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界关于对外开放战略选择的争鸣可以归结为工具型开放和制度型开放及其不同组合的讨论,中国经验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贸易分散化改革先于贸易自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从三个方面体现了“制度型开放雏形”的基础性作用:第一,通过下放外贸经营权、塑造多元市场竞争主体,为后续关税等政策工具改革奠定必要的国内制度基础;第二,为国内企业通过内部竞争先行学习准备,从而增强其全面应对外部竞争(如投资、服务贸易领域)的适应能力;第三,通过扩大竞争性出口,矫正计划经济遗留的价格扭曲信号,缓解宏观政策环境的扭曲,从而提高后续贸易自由化改革的起点。中国实践清晰地表明,优先实施对外部门向国内延伸的“大陆架”部分的某些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借助有效战略组合为更深层次和更为广泛的工具型开放和企业的“竞争暴露”铺平道路。

三、制度型开放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

从工具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范式转换大幅拓展了开放经济学的学科边界,推进学科前沿阔步向前。杰出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学术巨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鲜明地指出,成熟学科中的范式组成

①克鲁格模型由以下三阶段构成:关税调节取代数量限制、改革关税、采用汇率管理进出口^[4]。

解密学科层次的基本结构,而动态视角新范式的诞生则会引发学科革命,并解构这场革命的科学层次^[5]。从规范国际经济学角度研究制度型开放,并予以科学概括和精确界定,必将带来国际经济学特别是规范的开放经济学学科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展示开放经济和贸易政策改革的新的知识图谱,从而产生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澎湃的学科发展新动力:

第一,构建制度型开放新范式,创新和拓展国际经济学学科范式和知识图谱。与实证视角(尽管其国际经济学和贸易模型演进的过程始终占有主体和母体地位)相对应,贸易政策及其改革构造了国际经济学规范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二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调整中,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极大丰富。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克鲁格理论模型中著名的三段式改革模式^①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造就了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然而,这一产生广泛影响的经典模型仍囿于纯粹的贸易政策工具改革,我们将其归结为工具型开放。尽管20世纪90年代作者在克鲁格模型基础上尝试模型扩展,以反映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独特实践和新鲜经验^[3],但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开放经济的基本原则总体上仍停留在工具型开放阶段。

第二,解析由工具型开放和制度型开放构造的开放经济发展的完整逻辑序贯,克服工具型开放引致“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困境。制度型开放作为一个新的开放样式,同工具型开放共同构成推进经济开放的两大范式。一国尤其是大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必须是有限度、渐进式的,广泛流行的本币可兑换性改革须按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依次展开,如约束关税分期下调等,而在工具型开放情景中,各国采用各类贸易政策手段在保护本国产业、促进出口从而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极易破坏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陷入“合成谬误”困境。制度型开放情景中的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可将其降低至最低水平,取而代之的是采用统一的国际规制、标准、规则、管理以及更为广泛的产业与竞争、技术和企业政策的深刻变革,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贸易政策工具引致的“合成谬误”。

第三,为我国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发展新格局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始终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目标,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旨在达成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方地位和加入WTO的目标,我们将直接行政调节措施关税化、自主降低关税和减少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而在加入WTO之后,通过同WTO成员就市场准入等议题按照一般最惠国待遇机制,达成互惠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的协议,有力地促进我国出口扩大、原材料与技术先进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增加,工具型开放从技术角度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制度型开放能够适应全球化新形势,充分利用制度本身拥有高效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及最优机制设计的供给能力,切实达成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奠定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基础。

第四,制度型开放理论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将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为创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勾勒出一个着力点。遵循学术和科学发展规律,采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以及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构建制度型开放新范式及相关理论框架;同时,针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转型和开放实践的新的理论概括及其应用,无疑将会为构建中国自主国际贸易学知识体系添砖加瓦。

四、实施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意义

构建对外开放战略的系统思维用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特有的缓解风险和不确定性功能,有效对冲全球化波动中的制度性摩擦并显著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从而形成高水平 and 具有韧性的制度供给,实现开放红利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对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①由作者总结、归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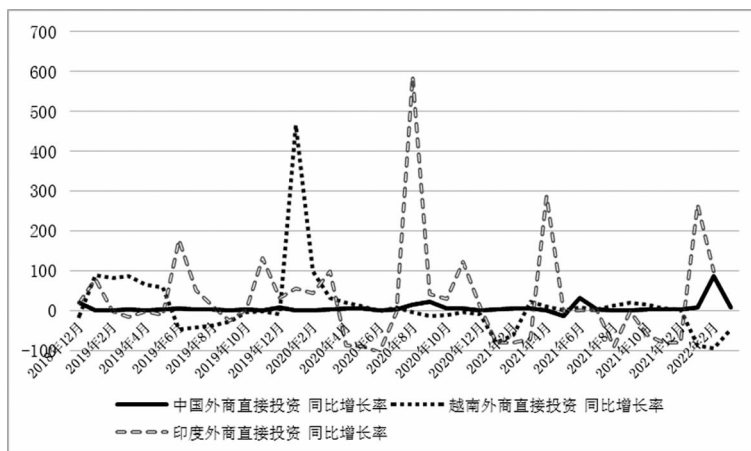
第一,制度型开放可有效解决全球价值链普及和深化条件下对外开放形式和手段选择问题。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多样性,特别是从全球价值链普及和深化中分离出逆向选择的动因,将有助于准确理解当今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复杂趋势与深刻矛盾。当前,全球化遭遇民粹主义逆流的严重冲击。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某些现象既是逆全球化的结果,又是实现逆全球化的载体。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向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回流投资母国的现象(见图1),警示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最新变化。准确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机理对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规避不利因素、保障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二,制度型开放可缓解以至消除工具型开放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强境外法人和自然人同我国经济交流的信心,改善中国经济特别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预期,为我国国内和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新的增长点。

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和改变完全竞争经济学假设的重要变量^[6],而贸易作为企业间外部价值链活动的通道则是风险溢出的载体^[7],企业自身合理的投资经营、资源配置和管理活动可以有效缓解以至消除上述风险。工具型开放的自身属性和特点不仅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的不确定性,甚或在某种情形下还会放大经济的不确定性,以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PU)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一大困境。图2是美国一制造业协会针对企业经理人的问卷调查结果。

然而,在支持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同时,多数企业经理人(占调查人数的88%)却主张精简供应链(见图3),这体现了企业对国际商务活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担忧。企业界流行的上述观念反映了当今全球价值链逆向选择现象,亦表明单纯依靠工具型开放难以消除经济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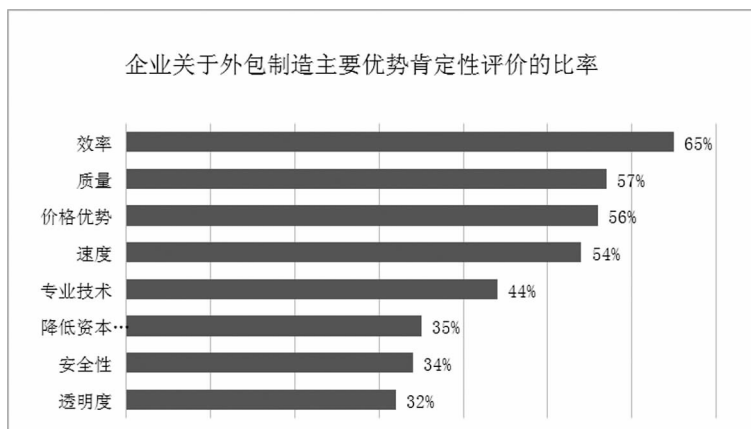
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初围绕利用外债还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争论与效果,则是制度型



来源: Official Statistics of China, Vietnam, India

图1 2019年以来中国、越南、印度 FDI 流动

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和改变完全竞争经济学假设的重要变量^[6],而贸易作为企业间外部价值链活动的通道则是风险溢出的载体^[7],企业自身合理的投资经营、资源配置和管理活动可以有效缓解以至消除上述风险。工具型开放的自身属性和特点不仅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的不确定性,甚或在某种情形下还会放大经济的不确定性,以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PU)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一大困境。图2是美国一制造业协会针对企业经理人的问卷调查结果。



来源: 2022 State of Manufacturing Report^①

图2 美国一制造业协会针对企业经理人的问卷调查结果1

注:图中数据系指在问卷调查设计的多选项中回答认为外包制造具有相关优势的企业数量比率。例如:效率65%即回收的问卷中65%的企业认为外包制造具有提升效率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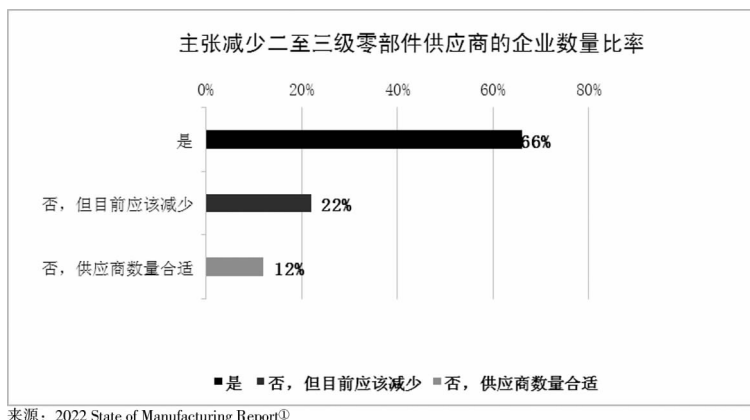
①详见: <https://www.fictiv.com/ebooks/2022-state-of-manufacturing>。

开放在消除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具有工具型开放不可比拟的功能识别的自然实验,尽管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难以提出成熟的制度型开放问题。通过举债利用外资实际上是政策工具型开放的典型方式,由于当时我国外汇储备匮乏和国内配套资金能力羸弱,通过举债扩大引进偿债风险巨大。经过数年摸索和实践,陆续推出“三来一补”直至建立外资企业方式利用外资,允许境外公司通过全资、参股、合作经营等形式参与公司治理结构及其运作。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转变与利用外资有关的企业政策(在国际贸易规则里表现为商业存在),是制度型开放不自觉的最初实践^[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成功范例表明,制度型开放对于消除利用外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同拉美国家依赖单一借债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带来的长期经济停滞和结构失衡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鉴于全球价值链的多节点和长流程的网络分布,某些特定的贸易政策效应的传导不可避免地被不断过滤,并且受到国别贸易政策的影响,从而偏离原有政策目标。根据美国 PIIE 的测算,2017 年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实施的新的关税政策对非中国籍企业影响远大于中国本土企业(见图 4)。因此,研究制度型开放特别是厘清所谓“深层整合”中政策传导效应的复杂机制,有利于我国利用战略和政策杠杆推进开放经济的发展。

第四,确保国际贸易政策体系的调整有效适应所谓“深层整合”的最新实践,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场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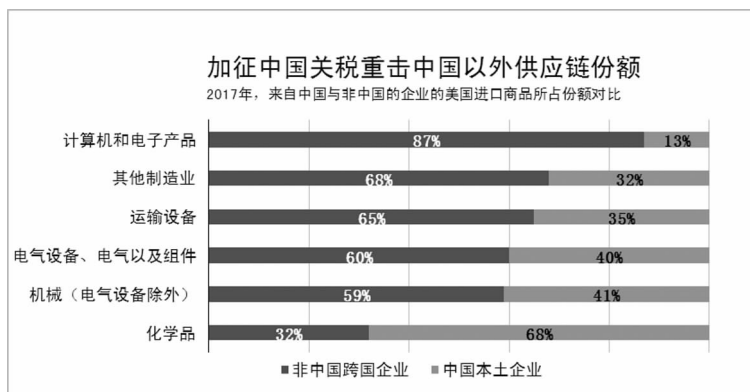
提供符合全球化规律、有利于我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层整合对“浅层整合”的国际贸易政策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挑战。GATT1947 第二部分关于国内商业政策的条款已触及“深层整合”的全球经贸规则,但缘于 GATT 缔约方和 WTO 成员复杂的国



来源：2022 State of Manufacturing Report^①

图3 美国一制造业协会针对企业经理人的问卷调查结果 2

注：图中数据系指在问卷调查设计的单选项中回答是否计划减少二至三级供应商的企业数量比率，即主张减少者、不主张减少但目前应当减少者（应对当前短期供应链不稳定）和主张不应当减少者（当前二至三级供应商数量合适）分别占 66%、22% 和 12%。



来源：Trump Tariffs Primarily Hit Multinational Supply Chains, Harm US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②

图4 2017年美国对中国施加关税的不同企业的影响

注：这些部门由美国商务部划分为专利密集型行业。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8年6月发布的报告,图中所列部门是特朗普政府修订的301条款关税清单中重点打击的一部分。图中数据系指特朗普加征关税分别由“非中国跨国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承担的份额。

①详见：<https://www.fictiv.com/ebooks/2022-state-of-manufacturing>。

②详见：<https://www.pii.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2018/trump-tariffs-primarily-hit-multinational-supply-chains-harm-us>。

内决策权力结构,该部分条款一直游离于一般最惠国待遇机制之外,尽管乌拉圭回合约定的 GATT1994 及其他专门协定并通过 WTO1999 年新加坡首届部长级会议确认国内商业政策部分回归一般最惠国待遇机制,但这一机制的实施并非完整和充分有效。诚然,近年来“深层整合”已被提上贸易政策改革的议事日程并已引发学者关注,但在一国国民部门内部系统实施制度型开放则是一项新的任务。不同于工具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包含国内商业政策在内的各类涉外政策改革的综合解决方案,将较好地适应非传统国际贸易兴起和全球价值链普及的新形势,并以中国方案推动国际贸易政策体系重构。

五、推进制度型开放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价值链普及以及其向国内产业活动的深度嵌入,在促使国际分工格局与利益结构和我国扩大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同时,不仅使得现有国际贸易政策及其工具的使用面临适用空间收窄、有效性下降、招致贸易伙伴对等报复的困境,而且还易使外界怀疑我国对外开放的坚强决心。这表明,应用于典型水平分工情形和简单的边境往复的初级全球价值链的工具型开放已难以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活动普及和深化的新形势,尤其是同国内经济体制相交织的所谓“边境内措施”具有的复杂性、系统性。开放型经济面临新的路径选择,迫切需要实施由工具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在贸易政策端对标有关国际制度、规则、规制、标准开启和深化有关政策、体制机制的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型开放框架内设计产业政策端等的相关改革,亟须构筑制度型开放的经济学学理基础并用以指导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和政策设计。

面对上述挑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考察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中工具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嬗变的规律性趋势和经济学机理;运用科学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构筑制度型开放新范式的坚实学科基础;重点探寻制度型开放对于消除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固有风险不断增大的特有功能;考察开放经济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普及深化条件下,国内商业政策多环节传导效应及其机制的复杂变化,加强“边境后措施”的政策设计和经济学分析;深入讨论制度型开放中贸易政策端改革问题,增强供应链的稳定、安全和韧性,以缓解价值链活动全球联系的不确定性,并着眼于贸易政策同国内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的协同;考察经济开放语境中部门和企业层面活动规律,讨论和设计制度型开放中的产业政策端改革问题;通过实施具有系统性和稳定性的制度型开放,为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

这就要求有关学术研究有效提供满足制度型开放这一新的学科范式初创阶段所需的理论构建和知识供给,同时挖掘制度型开放确定性预期的特有功能,从而有别于已有的工具型开放,典型的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开放经济的负面效应;同时,还应提供着眼于制度型开放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贸易政策端和产业政策端改革的系统设计,并能确保这一改革设计和实施完美实现系统性和稳定性要求,成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

六、结语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促进“十五五”时期以及更为久远的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制度型开放是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全新实验,亟待构建和创新国际经济学特别是贸易政策改革领域的理论架构,以便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高成熟的理论准备。鉴于制度型开放具有复杂系统的本质特征,应当采用分析方法,加强制度型开放情景中产业与竞争政策端、贸易政策端及其互动机制固有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应在此基础上,通过综合视角加强政策工具箱中与贸易政策有关的各要件间传导和互动机制的深入研究,并牢固建构有助于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相关战略的系统思维。

可以预期,通过构建具有鲜明系统性的对外开放思维,科学制定和稳步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必将

有力推进贸易政策的工具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从而确保制度型开放的顺利实施,显著增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活力,努力塑造互利共赢新格局;创造性地利用制度型开放缓解风险和不确定性功能,应对当前日益突出的全球价值链扰动风险及其宏观表现,并注意总结制度型开放干预全球化风险的新鲜经验和一般规律,为有效化解全球化复杂趋势中的各种风险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方案,彰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基本动力;加快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夯实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 [1] Lawrence R Z.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6.
- [2] 谷克鉴.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竞争政策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3): 39-49.
- [3] 谷克鉴. 制度变迁与市场国际化[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 [4] Anne O K. 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iberalization attempts and consequences[M].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lishers Co. for NBER., 1978.
- [5] Thomas K.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M].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6] Fr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M].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 1921.
- [7] 谷克鉴, 李晓静, 冯帆. 市场采购贸易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解构义乌外贸发展模式[C]. //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25)论文集. 2025-11-07.
- [8] 萧冬连. 探路之役: 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M]. 香港: 开明书店, 2024.

[责任编辑: 苗竹青]

Prudentially Enhancing Institution-based Openness: 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Paradigm for the Opening-up Strategy

GU Kejian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epen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have driven the shift in opening-up from the “instrument-based openness” dominated by GATT/WTO to the “institution based openness” specific to policy adjustment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aimed at achieving open economy goals. Institution-based openness has propelled trade policy reforms from “border measures” to the deeper realm of “behind-the-border measures,” requiring the breaking of the limitations of border measures reforms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rade,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and corporate policies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level open economy. This necessit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atic thinking for opening-up strategies, fully leveraging the unique risk mitigation and uncertainty reduction functions of institution-based openness, effectively hedging against institutional frictions in globalization fluctuation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ing cross-border transaction costs, thereby forming a high-level and resilient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achiev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he dividends of opening-up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sequently, it is essential to accurately extract relevant scientific issues, extensively carry out academic research on steadily expanding institution-based opennes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institution-based openness, and be aware of the various challenges faced by institution-based openness, in order to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ovide powerful policy tools for the shift from instrument based openness to institution based openness of trade policies.

Key Words: institution-based openness; instrument-based openness; global value chain; open economics